

坚 守

从『映秀母亲』到

『山里码头客栈』

古学斌 张和清 欧阳令芝 著

丛书主编

张和清 古学斌 程玉 齐华栋

Sticking to Our Dream:

From "Yingxiu Mother" to
"Matou Guesthouse"

灾
害
启
示
录
系
列

丛书主编 张和清 古学斌 程玉 齐华栋

坚 守

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

古学斌 张和清 欧阳令勃 著

Sticking to Our Dream:
From "Yingxiu Mother" to
"Matou Guest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 / 古学斌，张和清，欧阳令芝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灾害启示录系列)

ISBN 978 - 7 - 5201 - 0663 - 4

I. ①坚… II. ①古… ②张… ③欧… III. ①救灾 – 社会工作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7547 号

灾害启示录系列

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

著 者 / 古学斌 张和清 欧阳令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黄 丹 杨桂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9.25 字 数：14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663 - 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鸣谢择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香港
凯瑟克基金会给予项目的资金支持

献给灾后重建路上一直相伴同行的社区民众
和社工们

丛书总序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杨锡聪 张和清 程玉 齐华栋*

自 2008 年汶川地震掀起“公益元年”的热潮后，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越来越得到各界认可。然而，灾害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灾后服务的高压力和持久投入，让很多不被觉察的知识和珍贵的经验还没来得及被书写和整理，就随着不断流失的人员和转行的机构沉入历史长河。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历次灾难的救援和资助中，逐渐整理形成“正面灾害观”，并敏锐地体察到人才和经验对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积极意义，于是在 2014 年底发起灾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经验梳理计划，先后协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进行资助，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主办，建立

* 杨锡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具有 20 余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 9 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具有 18 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 9 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程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网络项目”的策动者与陪伴者；齐华栋，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具有 9 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

了“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以下简称“灾后行动学习网络”）。该计划期望联合灾后恢复重建一线的行动者、教育者、研究者，分享和梳理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后社会服务水平和研究水平。

灾后行动学习网络是一个集体生产知识的学习型社区，目标是寻求改变。简单的精神、不固定的技术，这些是维持网络生命和活力的重要元素。成员在参与灾后服务前，曾经是商人、军人、教师、职员、护士、公务员或者大学生等。在灾后行动学习网络里，他们同时拥有经验和问题，也同时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是“逆境中的伙伴”。大家以“线上”的群聊和“线下”的聚会联结，在分享、互动、合作的过程中凝聚成为生命共同体。诚然，这样的陪伴和书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波澜起伏亦如一部悬疑剧或密室逃脱，而我们需要和大家一起去寻找打开每一扇门的钥匙。

本套丛书便是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成果之一，一共有四本：《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和《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我们从“生命故事”和“行动案例”两个取向来加以呈现。它的意义有三：一是关注、关怀和理解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者，他们鲜活、立体的生命故事有着很大的感召力；二是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召唤更多的一线工作者参与“行动的经验”的整理和书写；三是探索和分享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

第一，透过“生命故事”关注、关怀和理解行动者。过去和当前，我们主要将目光聚焦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环境的变迁，以及公益项目的开展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对这些宏大议题和行动背后的“人”却较少关注，然而公益毕竟是要靠人去做人的工作，理解“人”比理解“事”更难，但更重要。《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

记录的是一个又一个“记不清了”，但又在不断回忆和讲述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真实故事。正是这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画面，将我们拉回到当年举国轰轰烈烈抗震救灾的社会图景中，也让我们直接又真实地体察到面对灾难的人类本性与希望。《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则反映了作者们不同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公益，他们如何审视目前的选择，未来是否会更好。这样的书写，更重视生活体验和关注内心感悟。也是在这样写故事和看故事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生命意义上的互动。

第二，召唤、整理和书写“行动的经验”。灾后服务的经验往往由研究者书写，灾后服务的培训也由研究者来完成。而“行动的经验”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流失，隐含着“人”和“事”的分离、研究和实践的割裂。因此，我们要让工作者同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是使其成为被动的学习者和接受培训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讲述的是绿耕在“映秀”和“草坡”八年的坚守。“映秀母亲”的刺绣项目曾多次作为灾后心理援助的典型案例，但终因封镇搬迁难以持续。“山里码头客栈”曾经是绿耕人的梦想，也终因泥石流天灾和新的扶贫政策不得不完全撤离。八年的跌宕起伏，呈现的是中国式救灾图景中社会组织艰难的路径探寻过程。这让我们再次反思：面对漫长而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社区重建，尤其是老百姓的精神重建，灾后应急机制是否真的无能为力？《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既不是以数据、图表为重心的项目报告或成功典范，也不是一部充满“干货”的经验指导手册，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有生命力的案例书写而成的，通过工作员第一角色的书写，探求一种可以穿透个体经验的、藏在经验背后的深层哲理。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情境，不仅应

是经验的传递，还应有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探索和分享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学习不单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与巩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经历，从群体动力的角度让我们肯定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性，因为单一文化的群体，出现有效动力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目标是将一群异质性很强的人结为共同体。因此，用传统的学习模式，例如主题讲座、案例分享、参访汇报等单向模式，容易把教与学二元对立起来，群体的动力难有质变，学习成果只依赖学习者的主动性及能力，学习成效的持续性就更没保证。灾后行动学习网络为了促进群体动力的出现，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的社区：主办方没有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制定确切的学习主题和内容，反过来希望由学习者（网络成员）提出学习需求及目标，把网络理解为一个“村”并成立“村委会”，由“村民”自治自决。我们形容这是“立体”、“双向”的学习，从直接参与的经历中建设学习者的能力。这是单向模式难以发挥的作用。所以，只有将尊重成员的想法和需要、共同支持网络的生存和发展与满足自身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共生关系或共同体的状态才能持续。

序

转眼就到了“5·12”汶川地震九周年，这九年实在是过得太快，快得我们都没来得及停下来细致地整理这九年的经验、梳理我们的情感。

这九年在灾区的工作，从映秀到草坡，再到雅安，绝对是一个团队的集体奋斗。一直在我们团队中的有香港理工大学的杨锡聪老师，后期参与的有四川农业大学的齐华栋老师。早期参与映秀社工站工作的还有中山大学的裴渝新老师和闫红红，我们的社工康进、卢芝；后来金波项目除了社工康进之外，还有余长芳、黄艺；映秀重建结束，在张家坪社工站的是欧阳令芝、崔小维；后来转移到草坡乡建立“山里码头客栈”的除了欧阳令芝外，还有张蕾、许景皓和阳珍丽。项目实施前后还得到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生及志愿者的协助。项目之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当然也与当地政府、香港择善基金会、凯瑟克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列举这些名字，是想告诉读者和我们自己，一个行动研究项目的开展，绝对是一个团队的集体合力。我们三位，只是代笔把这些年做的这些事做一梳理总结而已。

书写此书极其不易，前后历经三年才算把它写出来，这也是侧身学院行动者和全身投入的实务工作者所面临困境的一种折射。侧身学院行动者在兼顾繁重的教学、科研、行政担子的同时又兼顾实

务，要安心书写，着实不易。实践场域是每天风云变幻、工作无法停顿的状况，我们几位老师虽然在学院教书，却也需要不断跑到项目点上督导社工、处理事务，身在学院时也需要不断及时回应项目点上的各种问题，还要为资金烦恼。社工扎在工作中，每天的事务已使他们疲于奔命，当然，束手无策时他们也会选择逃避，书写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件困难的事。

实践过程中的人与事，远比大家看见的要复杂得多，当中的情感也非笔墨可以形容。我们努力让过程还原，希望带着读者进入灾区现场，理解灾后重建是一件什么事，到底灾害社会工作是如何做的，是什么动力让这些人坚持不懈地坚守，到底当中的困境是什么……

书写是一种自我对话。此书的出版，算是团队对这么多年在汶川映秀和草坡工作的一个回看。回看时，我们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大时代的历史和结构。回看是为了让我们更多地认识自己，也更多地理解别人，明白灾难与大历史的关系。在书写此书的过程中，当年的画面如岁月流影，一幕幕在眼前重演，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初心，看见了民众的力量和智慧，看见了社区的资产与优势。这些年所做的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参与灾后社区重建的宝贵经验。

我们对自己说，回看是为了走得更远！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汶川地震、社会损失与社区重建	001
第二章 “映秀母亲”的故事	022
第三章 金波民宿和“山里码头客栈”的故事	075
第四章 从行动中诠释灾害社会工作	115
参考文献	132
后 记	134

第一章 汶川地震、社会损失与社区重建

“5·12”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九年，在这九年里，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社会工作者参与了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与研究。汶川地震后，笔者又先后参与了四川雅安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广东茂名泥石流、云南鲁甸地震等灾害的救援和重建工作，特别关注社工介入灾后救援和社区重建方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式救灾模式有深刻的体会和反思。

灾害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既有物质损失，也有社会损失。但是，人们更容易关注到的是物质损失，比如地震造成的天崩地裂、房屋倒塌、断水断电断路等，而对非物质的社会损失，诸如家破人亡的精神痛苦、生计归零的紧张绝望、亲友离散的孤独寂寞、看不到希望的焦虑担忧、干群关系的对立紧张等情况，关注不够，甚至是忽视。从汶川地震后九年的实践结果看，凭借中国式救灾模式对灾区民众物质损失的补救非常迅速有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在关乎灾后民众生计、社会关系、心理慰藉、文化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社会损失的补救方面，则进展甚微，甚至还有可能造成社会损失的加深。因此，我们需要在对中国式救灾模式反思

的基础上，探索社工介入灾后救援和重建的理念与策略。

一 中国式救灾模式在修复社会损失方面的局限

对未来生活拥有希望是灾后非物质重建最重要的目标。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灾及其造成的损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果人们无法战胜心理恐惧，就难以开展新的生活。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灾区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他们在自救和互救过程中的创举；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举国体制的救灾模式在抢救生命、物质救济、临时安置以及硬件设施恢复建设上的奇效，极大地增强了人们重新生活的信心。但是，这些侧重物质方面的重建并不能完全驱散弥漫在人们心中的深层恐惧，甚至无法阻止新的恐惧再生。

究其原因，乃是我们只是侧重物质损失重建，而忽视了社会损失的建设。中国式救灾模式本身就缺乏对灾害的社会性根源的反思，于是在社会损失的修复方面我们不仅缺乏想象力，无法理解灾害发生与社会结构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更缺乏行之有效的举措和重建结果。早在 2011 年，笔者即以受灾民众及其家庭“个体恐惧”的心理反应为例，开始探讨灾害的社会政治根源（见图 1）。

如图 1 所示，一方面灾区民众的深层恐惧感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5·12”汶川地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人为灾害（“人祸”）的双重作用力，这就是宏观社会政治对地方场景的影响；另一方面，震后一些灾区地方政府治理危机（干群关系紧张等）和资源分配不公平等地方场景形塑了普遍紧张的社区文化氛围，从而加剧了个人心理压力和恐惧感。但是，中国式救灾模式无论是在灾害的社会结构性议题处置方面，还是在社区文化氛围的改善，包括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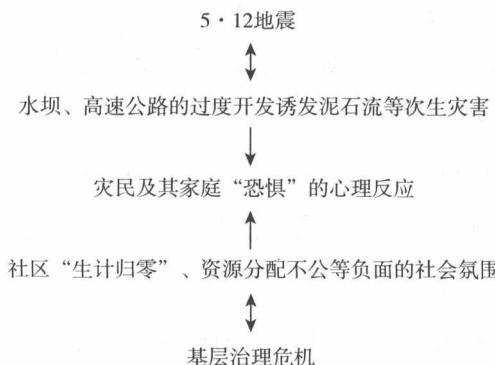


图1 恐惧心理反应

资料来源：张和清，2011。

社会心理恐惧的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等方面，都意识偏低，显得无能为力，以致震后至今很多人的灾难恐惧症状（许多人还受到“二次伤害”）还难以消除。

众所周知，人们对地震及地震前后水坝、高速公路大规模开发建设诱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从而导致社区居民恐惧的精神反应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图1“恐惧心理反应”上半部分的关系），相比之下，人们对基层治理危机与震后社区民众生计、资源分配等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加剧了个体的恐惧情绪的认识（图1“恐惧心理反应”下半部分的关系）还比较模糊。

在亲历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后，笔者于2010年撰写《灾后重建的尴尬》^①一文，谈及在灾后社区重建和防灾减灾的环节上地方政府治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干群关系对立的矛盾。抗震救灾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如资源分配不公、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盲目拆迁等关乎民生的问题很快浮现出来，群众不断挑战基层政府不作为。当面对群众提出的“豆腐渣工程”，物资、帐篷、板房等资

^① 本文未公开发表。

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时，基层干部不是回避，便是“以大帽子压人”，导致有群众反映“中央政策太好，地方干部乱搞”。二是灾后社区重建，尤其是社会心理的重建困难重重。固然，房屋、道路、水电等硬件设施的恢复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但最重要和艰巨的重建任务是社区重建。社区重建的核心目标是社区民众社会关系与文化生活的重建，既包括生计重建，也包括社会心理、社区组织、社会关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恢复重建。而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临时安置区都出现过震后社区基层组织（居委会、村委会等）处于运转不灵的状况。玉树地区的一位民政干部气愤地说：“基层什么家底都不清楚，原来报上来的数字是几百人，到分发帐篷时竟然冒出来上千人。”汶川县的一位干部说：“基层组织连辖区内的常住人口都搞不清楚，更别说流动人口了。”汶川灾后社区重建的实践表明，面对漫长而细致入微的社区日常生活（非物质）方面的社区重建，尤其是老百姓的精神重建，灾后应急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二 跨越式经济发展与中国灾后社区重建的 深层次困境

当“中国式救灾模式”结束后，四川省利用灾后重建的契机，动员式地发展经济，把灾后重建演变成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GDP）和工业化、都市化的契机，跨越式发展经济。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角来分析，这种灾后跨越式发展模式，不仅会制造社区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新陈代谢断裂，还会造成社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异化，从而形成“天灾人祸”的恶性循环（见图2）。

汶川震后四周年时，笔者之一在《灾后重生面临深层次社会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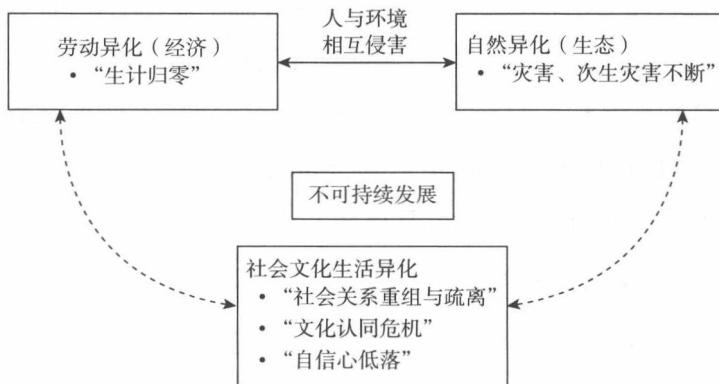


图2 震后城乡社区“不可持续发展”循环图
(实线“直接影响”，虚线“间接影响”)

境》一文中，就中国式灾后重建的跨越式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式灾后注重硬件设施重建的模式，更增加了灾后重建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张和清，2012）。无独有偶，2012年2月21日《新京报》刊发了题为《映秀“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地震遗址还是旅游景区？》的文章，指出：“如果单纯以外部视角看待震中争创5A级景区，是否会构成一种道德强制，而伤害了震中人自我选择的权利？”不仅质疑了灾后恢复重建中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启发我们应该从道德和地震遗址的角度反思生命、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重生，因为这关系到灾后社会根基的重建。

正是被投资拉动内需的跨越式经济增长氛围裹挟，汶川地震灾区许多民众逐步被物质欲望、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等价值观所支配，加快了追逐物质利益的步伐，难以停下脚步安静地反思生命与自然的价值，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修复，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第二章我们会详细谈到的绿耕支持建立的“映秀母亲”体验游客栈，原本的意图除了帮助灾区妇女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体验游”让游客学习灾区民众自力更